

社会科学论文集

第一辑

陕西师范大学

C 53

3:1

社会科学论文集

第一辑

陕西师范大学

一九七九年·西安

说 明

为了促进我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交流我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我们编印了《社会科学论文集》。

《社会科学论文集》坚决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解放思想，开展自由论争。暂定为半年编印一辑。这一辑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论文专辑，收集了校、系两级五四学术报告会提出的一部分论文。

这个集刊既然已经创办，就将继续下去。我们期待文科师生和研究人员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论文，用艰苦努力获得的研究成果充实和美化这块园地。

编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请大家提出批评，以便改进。

编 者

学大政理西刺

西大·平六六六

目 录

简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	房成祥 (1)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姚凤莲 (6)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与新文学的发展	黎 风 (18)
五四时期教育的新机	王少均 (31)
试论五四前后的秦腔改革	焦文彬 张登弟 (38)
五四运动在陕西	田 杰 韦建培 (49)
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阶级斗争	李巨方 (58)
客观性是真理的唯一特性	成一丰 田 岗 (63)
论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陈处昌 (74)
试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 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刘文义 (80)
谈谈生产力的要素问题	王 毅 (88)
试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宋文周 (95)
论价值规律的作用和企业独立性的关系	王子义 文占申 (101)
试论教育的社会职能	张安民 谢景隆 (108)
试论孔子的因材施教	黎顺清 (116)
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心理学遗产的研究	杨永明 李殿凤 欧阳仑 (120)

论《禹贡》的著作年代	史念海 (126)
“山寇”和三国	孙达人 刘九生 (141)
隋炀帝与隋朝的灭亡	牛致功 (152)
赵武灵王和他的军事改革	何清谷 (166)
试论太平天国后期进军陕西的战略方针	邵宏谟 韩 敏 (179)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暂时失利的原因	郑庆云 (187)
试论典型和典型人物的创造	刘建国 (197)
论《野草》的思想和艺术	江弘基 (213)
陶渊明评价中的几个问题	何世华 (220)
试论基本词汇	吴士勋 (230)
《三国演义》中的判断句	赵克诚 (237)
中学古代汉语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王家纯 (244)

简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

马列主义教研室 房成祥

五四运动揭开了伟大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序幕。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在中国首倡布尔什维主义的李大钊同志。因此，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热情洋溢地为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迎来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人们情不自禁的要想起五四运动的主将李大钊同志。为着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新的长征，本文将着重探讨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五四时期的革命思想。

(一)

我国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军阀混战不已，国家暗无天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批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为了使国家复兴，努力学习西方。尽管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总是行不通。到底为什么？怀疑产生了。这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李大钊同志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最先感到世界历史方向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举起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的先行者。早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当俄国无产阶级显示出英勇精神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李大钊同志立即注意到这个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意义。从三月起，他连续发表文章，研究二月革命的远因、近因、性质及其对欧亚两洲的影响。他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是“高树赤旗”、“壮快淋漓之活剧”，对于世界政治前途具有“关系绝非浅鲜”的作用。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实现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更加吸引了李大钊同志的注意力。他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拼命诽谤十月革命的情况下，在当时社会上“庆祝协约国战胜”的一片喧嚣声中，力拨浓雾，在《法俄革命的比较观》一文中，透过现象

看本质，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指明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他认为十月革命和法兰西革命“非可同日而语”，因为这两个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性质不同。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是这新世纪的曙光”。这些论点说明李大钊同志已经认识到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他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明确地表示：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翘首以迎”、“倾耳以迎”。他随即发表两篇重要论文，即：《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论文中，他高度评价欧战后由十月革命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以及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满腔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使世界惊秋的一片桐叶”；告诉人们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今后社会发展的前景定是“劳工的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是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所以，对待革命领袖列宁和思想武器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重要尺度。李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在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同时，热烈赞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导师列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的功业”。后来，在追悼列宁的文章中，他又用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等最美好的语言歌颂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人类历史上的伟人，高度评价列宁的丰功伟绩。李大钊同志拥护列宁、热爱列宁、崇敬列宁，这种感情和态度雄辩地说明他是列宁主义的忠诚战士。他当时还明确地认识到，十月革命和随之而起的世界革命高潮“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的。就是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所以，他主张认定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作工具”。随后，他又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拯救中国的导星”，因而主张“研考”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正因为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学习并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些说明，李大钊同志当时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十月革命是历史的转折。对十月革命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宣传还是攻击，是歌颂还是诋毁，对我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是严峻的考验。李大钊同志立足于科学理解社会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宣传十月革命，是难能可贵的，是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标志着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时曾经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同志恰好是这样。他当时在一篇论文中明确表示：我们对于十月革命这个“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他所说的“几个觉悟”，同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唤醒”是同义语，说明他被十月革命“唤醒”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悟。因此，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期内，发表了大量论文，在我国掀开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页，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信心。一九一九年，五四的号角响了！李大钊同志和赞成俄国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共同领导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公认的一员主将。他把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仇恨，一起迸发出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发起猛烈进攻。这个时期，他的所有论文，都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渗透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充满着对美好未来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必胜的信心。

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信念。他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应运而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世界革命高潮看清了世界的远景，满怀信心的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充分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是人类历史上无限美好的未来，是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那末，怎样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同志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认为必须根本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

第一，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等论文中，揭露“亚细亚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和巴黎和会，斥责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日本统治阶级代言人小寺谦吉等，戳穿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特别应该指出，李大钊同志在抨击帝国主义侵华罪恶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实际上掌握着中国的统治权力，北洋军阀政府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而已。他在短小精悍的杂感录中写道：“共和国的政主到底是谁？”“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这“太上政府”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指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尽管他当时还没有用半殖民地这个名词，但是，他的思想已经很明确了。针对中国这种状况，他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口号。所谓改造强盗世界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谓实行民族自决就是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李大钊同志首先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观察，说明他已经“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是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反帝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极其巨大的进步。

第二，李大钊同志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状态，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革命途径。他在《唐山煤矿的工人生活》、《青年与农村》和《战后之妇人问题》等论文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工人、农民和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剥削和侮辱是极端严重的。他指出，无产阶级遭受着残酷的掠夺和压榨，工人的生活简直“不如骡马的生活”；农村黑暗达到极点，农民遭受着“官绅们宰割蹂躏”；劳动妇女“天高地阔，只有一

身”。他对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厚的同情。可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那里呢？他从瘟疫及其受害者是广大劳苦大众说起，义愤填膺地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灾是“人为的恶”，是反动的统治造成的。这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问题。因此，他在同胡适派的斗争中，曾经尖锐地指出，必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必须进行一场革命，而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动，经济基础的变化，必不可免的要引起革命。那么，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李大钊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学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十月革命看到了俄国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经验，对法、俄革命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断定法国式的革命已经过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因此，他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虽然“尚在幼稚”、“尚在初步”，但是，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在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理所不可”、“势所不能”。中国革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奋起直追。尽管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应该分成两步走，然而他的上述思想却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心目中已经破产。李大钊同志已经明确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第三，十月革命是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夺得政权取得胜利的。李大钊同志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他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存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阻碍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还见这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于他认识到劳动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看到中国工人阶级逐渐壮大及其在斗争中显示出来的巨大作用，因而便找到了可以依靠的真正革命的伟大力量。所以，他当时反复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应该正确对待工农革命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道理，并猛烈地批判“孔门贱视劳工”的反动历史观。为了组织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反动派作斗争，他首先在中国提出知识分子改造自己，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并在毛泽东同志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之后，也撰文号召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要有“大联合”。李大钊同志这种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以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进行斗争的思想，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又一个巨大的进步。

从李大钊同志在五卅时期发表的大量论文来看，虽然还有这样那样不尽完善之处，但其主流方面却是宣传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三)

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便走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李大钊同志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特别是经过领导五四运动的实际斗争，逐渐认清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同世界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他《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把五四运动同世界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他说：“此次五四运动，……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行进，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我们如果把他这个演说同他当时发表的其它论文联系起来研究，便不难看出他已经形成一种观念，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同志在向全国人民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指出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劳苦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因此，他主张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这里，李大钊同志又一次强调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指出：“十月革命所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他认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只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主张国际间弱小民族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并进一步把这个思想引伸为被压迫民族大联合，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李大钊同志的这个思想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观点。中国的革命运动不断在前进，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亦日益增大，因而他的这个思想观念也就越来越明确，以至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中国出现革命高潮和帝国主义阴谋干涉中国革命的形势下，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一文中，估价中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时提出的。他说：读了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以后，应该认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尽管李大钊同志当时还没有明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对“一部分”这个命题也还没有发挥，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李大钊同志的这个重要论断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卓见，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们从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思想发展便不难看出，他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大批的”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五四时期革命思想的本质特征就是“赞成俄国革命”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这就是说，李大钊同志在五四时期已经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道路，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政教系 姚凤莲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¹这个革命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和民族觉醒，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在思想界掀起了一个追求真理的热潮，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革命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意识形态；这个革命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促进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五四运动，继承五四革命精神，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这对完成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谈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五四时期的出名人物陈独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以后他又成为取消主义者，堕落成托派，这些都必须进行批判。但决不能因此而抹煞他在这一时期所起的进步作用。在“四人帮”的党史里，陈独秀一出场就是个坏人，是一个天生的机会主义者，历史上一贯反动，一点不懂马列主义，这完全是歪曲历史。对陈独秀的评价，我们应以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为榜样。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后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不可饶恕的，说他给俄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性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性要大百倍。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的错误，而否定他在《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否定他早期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光辉。相反，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早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方面有很大功绩，认为普列汉诺夫早期写的许多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²培养了一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早期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成绩。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的情况虽不完全相同，但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和发起组织共产党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影响。

(一)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黑暗反动的年代，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废弃共和，复辟帝制，登上皇帝宝座，以袁家王朝代替了被推翻的清王朝。这时，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也掀起了一股恢复封建文化的复古逆流。帝国主义分子攻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封建卫道者康有为宣扬“非复辟不能救中国”一时社会上“孔道会”“尊孔会”纷纷出现，鬼神迷信之说也流行起来，“灵学会”“灵学杂志”到处泛滥，为复辟封建帝制大造反革命舆论。

为了反击这股妄图倒转历史巨轮的复古逆流，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更为猛烈、影响也更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是属于旧民主主义范围的文化革命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场新旧思想的大激战中，陈独秀坚决勇猛，冲杀在前。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此，新文化运动就以《新青年》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主义。《新青年》树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介绍西欧新思想，批判中国旧思想。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青年》杂志的主编人，这时活跃于思想论坛。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首先发出了“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就应“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号召，提出了要民主与科学的战斗口号。他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又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物之兴，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³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民主，是指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歌颂法兰西革命开创了近世文明，“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他说：“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⁴他还说：在一七八九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发表“人权宣言”后，欧洲人民“若梦之觉，若醉之醒”，经过法兰西革命才建立了民主政治。他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是“近世文明”的精华，他以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还针对北洋军伐的独裁统治，提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数千年以来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还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须使备受专制政治之苦的千百万国民觉悟起来，掌握民

主权利，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贤人政治”或“伟人大志”身上。否则，宪法将为一纸空文，民主政治将成泡影。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科学，是指用资产阶级的现代自然科学和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神秘主义，反对封建思想。他号召青年要大胆解放思想，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他鼓励人们去怀疑那些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旧观念，用理性和科学去衡量一切，判断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他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和观念，如果经理性和科学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⁵

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就要反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因为孔子的思想学说是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是历代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精神工具。一九一六年当康有为上书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并写进宪法，鼓吹以孔孟之道为立国的精神时，陈独秀立即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指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不能以它为教育大本，横断写进宪法，定孔教为国教，不但违犯思想自由的原则，而且违犯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与共和制度是不相容的。他说：“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⁶他认为孔子是生长在封建时代里，他所提倡的道德、礼教是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他所主张的政治是封建时代的政治，他所心营目注的是少数君主贵族的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无关。陈独秀认为孔子的学说是封建时代陈腐落后的东西，已远落后于现代生活，与现代经济和民主政治势不两立。他说：对于这种与新社会不相容的孔教，必须要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⁷他还说：“共和政治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原则，与纲常阶级为绝对不能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⁸否则不但没有共和政治，就连共和招牌也挂不住。这说明了孔子学说与共和制度是不能并存的。为了实行共和制度，就必须把孔学抛到垃圾箱里去。可见陈独秀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十分痛恨坚决反对的，他是“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先锋。

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就要反对宗教迷信思想，因为宗教迷信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思想的“鸦片”。陈独秀根据他所掌握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宣传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反对灵魂主宰宇宙的宗教邪说。他指出：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耶和華上帝、玉皇大帝等一切神佛仙鬼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他一连提出了八个质疑，驳斥“神佛仙鬼”论，他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而鬼神都是“玄妙非为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⁹又说：宇宙间一切物质的生存与活动都有其规律，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决非神灵为之主宰。他认为一切“神佛仙鬼”等宗教迷信，都是科学原理不能解释的，都同唯物论无神论原理相违背，是虚伪不可相信的，是愚昧的骗人的，都应该打倒。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若因为拥护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¹⁰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是以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的革命姿态和批判精神闻名于思想界的，是继洪秀全、严复和孙中山之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

进人物。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满腔热情地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共和制度，反对皇权，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宣传无神论，反对神鬼邪说；宣传科学，“真实的合理的信仰”，反对宗教迷信。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呼吁人们去破坏一切“骗人的偶像”，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进行了坚决勇猛的冲杀，不愧是战斗在文化革命疆场上的一名勇敢战士。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继“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后，又进行了文学革命。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但他的主张只限于文学表现形式的改良，把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改革的最高目的，他没有把提倡白话文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有过与封建主义斗争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¹¹他提倡白话文，是为了宣传实用主义，而且态度很不坚决，曾一再说：“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¹²陈独秀则相反，他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联系起来，认为要革新政治就必须革新文学，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工具，并能够促进政治革命的发展。接着他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即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他还表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宣战。”¹³他对提倡白话文，也是非常坚定的，他在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态度时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¹⁴这说明了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也是旗帜鲜明、坚定勇敢的革命战士。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也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¹⁵于是，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历史上便出现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掀起了一个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这时也向前迈进了一步，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开始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了。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李大剑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同《新青年》这时都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剑同志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论文，起了巨大的传播作用。但这时的陈独秀还没有从法兰西文明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他虽然也看到了俄国革命，同情人民的苦难，不忍听“贫民的哭声”，但他心中仍迷恋着西方的文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仍局限在旧民主主义革

命范围内，对十月革命观望犹豫，认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在中国“似可缓于欧洲。”一九一八年十月，当李大剑同志已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后，陈独秀还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另一条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这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观点，根本没有看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且还错误地把协约国的胜利，叫做“公理战胜强权”，说什么在巴黎分赃会议上“美国大总统威尔逊的屡次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¹⁶他还厌恶阶级斗争，说什么我们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我们渴望资本作用渐渐消失，不要造成阶级斗争，而那些不慈善的人却要恶作剧，制造阶级斗争。他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也表现了妥协，主张由“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直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逐渐有所认识，才逐渐倾向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了。这时他指责协约国也是“强权”，不是“公理”，认为在巴黎和会上，所谓的公理、永久和平，所谓的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全是一文不值的空话。认为象这样的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比十万八千里还远。认为世界上的问题，若单靠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们弄鬼，是绝没好结果的，必须靠全世界的人民起来共同解决才行。他还认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造成了世界上的无穷罪恶，我们应该把它们抛弃掉。接着他又肯定了国际革命党（即共产党）是反帝最坚决的力量，能帮助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他希望国际社会党和中国社会党联合起来，打倒国际的强权，主张国际革命，特别希望国际社会党来帮助中国革帝国主义的命。这时他也开始认识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说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认识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所讲的民主和俄国无产阶级所讲的民主不是一回事，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于是，他发出了中国人需要“俄国精神”的呼声。他还认为生产劳动者因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有输入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可见，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由于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陈独秀深受影响，由倾向社会主义进而宣传了社会主义。他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根据《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主要宣传了下面一些观点。

首先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必胜，资本主义必亡是必然的。他指出法兰西大革命，打倒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代之而兴，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

“全国的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所以共和底自由幸福多数人是没有分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产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都是不可逃的命运。”¹⁷他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生产过剩而引起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并得出结论说：“我们可

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并说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¹⁸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其次，宣传了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陈独秀在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反对阶级斗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时，比较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时也逐步克服了他原来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在批判胡适散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谬论时，陈独秀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定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¹⁹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谈马列主义，搞无产阶级革命。并说我们所以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只能采取革命的手段。

在批判研究系政客张东荪、梁启超所贩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陈独秀指出：张东荪等人所鼓吹的靠帝国主义帮助，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兴办教育，使多数人过着人的生活所谓“救国道路”，完全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正象上海正记者在《人的生活》一文中所揭露的那样，张东荪“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²⁰中国走这条道路只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²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开发实业，使劳动者过人的生活。为此，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推翻现存旧制度，否则象张东荪那样靠帝国主义开发实业，靠资本家救国救民，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是没有希望的。他还公开表示说：“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²²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要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还痛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散布的中国落后，没有工人阶级，不必组织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指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建立自己的组织，才受中外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的目的。”²³说明组织共产党搞无产阶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他还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造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²⁴可见中国工人阶级早已存在，所以组织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可能的、有条件的。

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陈独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

多数极苦的生产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的组织社会出现。”这样，“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²⁵这就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获得彻底解放，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要国家，不要政权，去做有产阶级的的好朋友。陈独秀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绝对自由”，指出：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把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造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的国家，同时资产阶级利用自由主义给劳动阶级带上了枷锁镣铐。将来的理想的社会，是不能再迷信那“自由主义”了，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质。

在揭露考茨基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时，陈独秀指出：考茨基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合乎民主政治，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恶意攻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克思的主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而这个在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里又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治权，渐次夺取资本家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的劳动者手里。”可见，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自称为马克思派的考茨基倒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凡是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他们企图采取竞选手段，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这种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议会主义”，不但不能施行社会主义政策，而且会被资产阶级同化，最后只能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所以他认为“从革命去到普通选举！从劳动专政去到议会政治！”是修正派社会主义底格言。

此外，陈独秀还宣传了劳工神圣，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他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²⁶所以他主张应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倒转过来，实行“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²⁷

以上说明了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受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影响，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